



插图本外国文学史系列丛书



插图本俄国文学史

刘文飞 / 编著

09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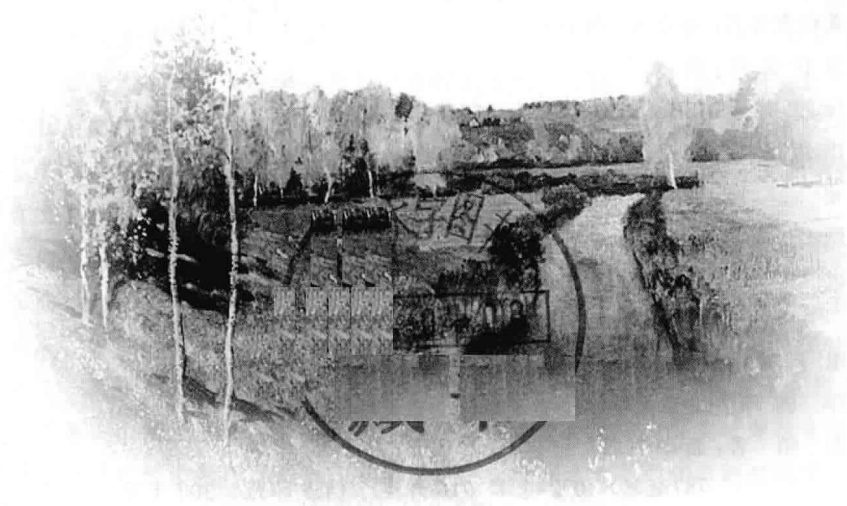
插图本俄国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插图本 俄国文学史

刘文飞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图本俄国文学史 / 刘文飞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3
(插图本外国文学史系列)

ISBN 978-7-301-15048-1

I. 插… II. 刘… III. 文学史-俄罗斯 IV. 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2590 号

书 名: 插图本俄国文学史

著作责任者: 刘文飞 编著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048-1/I·20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4.5印张 300千字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研究俄国文学已近卅载，在感受其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时常觉察到她的神秘莫测，在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有这么几个颇费思量的历史之“谜”：

首先，在世界民族文学之林中，俄国文学相对而言是一位迟到者，其历史不过千年，然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它却后来居上，向世界贡献了大批的名家和名著，从而成为人类文学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个文明发端较晚、文化传统并不十分深厚的民族，何以突然以文字和文学见长？俄国文学在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沉寂了许多个世纪，直到彼得改革后才开始亦步亦趋地模仿法、德、英、意等国的文学，可她为何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后就突然腾飞，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学之一？俄国文学迅速崛起的内在逻辑性、亦即其原因和动力究竟何在呢？

其次，俄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有目共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在俄国社会，至少是从普希金开始，作家从来就不仅仅是作家，而是集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甚至社会活动家等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位作为社会精神领袖、被视为民族良心的大作家；文学也不仅仅是文学，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启蒙手段、思想武器和意识形态载体。与“文学政治化”相伴生的，也时常有某种有趣的“政治文学化”表现，如叶卡捷琳娜、托洛茨基、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涉足”文学。俄国文学对戏剧、音乐、绘画、电影、舞蹈等领域的渗透和影响如此巨大，使得这些艺术门类往往沦为文学的跟班和侍女。这种“文学中心主义”的起源和意义何在？该如何理解它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未来命运呢？

第三，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呈现出某种爆炸式、跳跃式的发展态势，而始终不是一个循序渐进、平铺直叙的过程。普希金去世时，果戈理曾预言这样的天才要过两百年才能再出一个，不承想，在普希金之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天才”却成群地诞生，构成世界文学星空的一个璀璨星团，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的第三高峰。托尔斯泰之后，俄国作家再次求学于法国象征主义等西欧现代文学流派，但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们便以“白银时代”的辉煌震撼了世界，他们为所谓的世纪末情绪寻找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在寻神的同时“创作生活”，将宗教存在主义的求真与社会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相调和，对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如今虽然面临着截然不

同的评价，但它毕竟产生出了高尔基、肖洛霍夫这样的大师。20世纪中期开始，在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遭到普遍质疑之后，根基深厚的“主流”文学，暗渡陈仓的“地下”文学和后现代文学，昂扬激越的持不同政见文学，花开墙外的侨民文学，众多的“次文学”既相互角力又相互补充，共同组成20世纪俄国文学的合唱队，并推出了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样的新经典。俄国文学这一次次气势磅礴的爆发，其核心驱动力大致是什么？这几个辉煌文学时代各自的特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最后，俄国文学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与权力、与政治的游戏之中，其幸运与不幸相互交织的悲喜剧也由此而来。从普希金的“诗人与沙皇”、“诗人和群氓”的对立，到布罗茨基的“诗与政治”、“个性与集体”的冲突，俄国文学始终体现出一种难以遏止的个性追求，一种强烈的知识分子情愫。俄国教会大分裂后，俄国文学中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异教色彩”和“分裂派传统”；在俄国首倡讽刺文学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最终却不能容忍文学对她的讽刺；普希金与宫廷若即若离、对峙多于合作的微妙关系，后来成了19世纪大多数俄国作家推崇或心仪的姿态；在整个20世纪，革命和保守，正统和边缘，官方和地下，颂歌和异议，境内和境外，“我们的成就”和“古拉格群岛”等等，这些对立的统一始终贯穿在俄国文学之中。纵观俄国文学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学和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候，往往也是俄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候，而来自官方的压力却总是会导致文学的强力反弹。该如何认识俄国文学在塑造俄国知识分子性格方面所起的作用，反过来，俄国知识分子的在野立场又对俄国文学的性质和风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政治和权力的博弈或调情，对于俄国文学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是喜还是忧呢？

或许，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纠缠起来，会合成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谜。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本十来万字的小书，即便附有众多或旁证、或补充、或直观诠释的插图，也自然无法给出圆满的答案或谜底。笔者在此想做的，仅仅是给出一个关于俄国文学千年历史的简明索引和图示，以使更多的读者对俄国文学产生兴趣，并进而诱惑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关于俄国文学的猜谜游戏。

刘文飞

2009-3-11

于美国密歇根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19世纪之前的文学	1
第一节	史事歌和编年史	2
第二节	《伊戈尔远征记》	4
第三节	彼得改革时期的文学	6
第四节	古典主义	8
第五节	叶卡捷琳娜与讽刺文学	13
第六节	感伤主义和卡拉姆津	15
第二章	19世纪初期的文学	18
第一节	克雷洛夫	19
第二节	浪漫主义	21
第三节	格里鲍耶陀夫	25
第三章	普希金	27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	28
第二节	创作主题和特色	31
第三节	普希金的意义	35
第四章	19世纪中期的文学	38
第一节	莱蒙托夫	39
第二节	自然派	42
第三节	果戈理	44
第四节	革命民主派批评	47
第五节	赫尔岑	51
第六节	丘特切夫	53
第五章	19世纪下半期的文学	56
第一节	屠格涅夫	57
第二节	冈察罗夫	60

第三节	涅克拉索夫	62
第四节	奥斯特罗夫斯基	64
第五节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66
第六节	契诃夫	68
第六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	71
第一节	早期创作	72
第二节	两部“手记”	73
第三节	《罪与罚》	75
第四节	《群魔》	76
第五节	《卡拉马佐夫兄弟》	78
第七章	托尔斯泰	80
第一节	“明亮的林中空地”	81
第二节	《战争与和平》	83
第三节	《安娜·卡列尼娜》	85
第四节	《复活》	87
第五节	托尔斯泰的出走	89
第八章	白银时代的文学	92
第一节	白银时代	93
第二节	象征主义和勃洛克	95
第三节	阿克梅主义和阿赫马托娃	103
第四节	未来主义和马雅可夫斯基	108
第五节	布宁	112
第六节	茨维塔耶娃	115
第七节	“新农民诗歌”和叶赛宁	119
第九章	十月革命后的文学	123
第一节	革命和文学	124
第二节	20年代的文学团体	127
第三节	侨民文学	130

第十章	高尔基	132
第一节	一个现代文学神话	133
第二节	流浪汉小说	134
第三节	《海燕》和《母亲》	136
第四节	《忏悔》和造神论	137
第五节	《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	139
第十一章	苏维埃文学	141
第一节	“英雄”的诞生	142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44
第三节	“劳动之歌”和“教育诗”	146
第四节	卫国战争文学	150
第十二章	20世纪中叶的文学	155
第一节	解冻文学	156
第二节	普里什文	159
第三节	布尔加科夫和《大师与玛格丽特》	162
第四节	帕斯捷尔纳克	166
第五节	肖洛霍夫	168
第六节	“高声派”和“细语派”诗歌	170
第七节	战争文学的“新浪潮”	173
第十三章	“停滞”时期的文学	176
第一节	“停滞”时期的文学生活	177
第二节	乡村散文	179
第三节	道德题材文学	180
第四节	西伯利亚文学作家群	183
第五节	战争文学的“第三浪潮”	186
第六节	回归文学	189
第十四章	索尔仁尼琴	193
第一节	被逐的“先知”	194
第二节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195
第三节	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	196

第十五章 布罗茨基	199
第一节 从“小于一”开始	200
第二节 “悲伤与理智”	201
第三节 “文明的孩子”	204
第十六章 苏联解体后的文学	206
第一节 “后苏联文学”	207
第二节 后现代文学	209
第三节 当代女性文学	212
第四节 佩列文	221

第一章

19世纪之前的文学



史事歌最早出现在基辅罗斯，基辅罗斯于12世纪下半期开始衰落之后，史事歌逐渐传向西北方向，最后在诺夫哥罗德地区赢得繁荣，因此，俄国古代的史事歌有两个主要的分支，即基辅史事歌和诺夫哥罗德史事歌。史事歌中唱到的历史人物和传说英雄有上百个，但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位，即基辅史事歌中

在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时期，史事歌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在地广人稀、冬季漫长的罗斯，它成了让人们聚集起来进行交流，围坐在一起享受精神愉悦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它也是俄罗斯先民借以重

史事歌为一种无韵诗，篇幅一般不长，最常见的修辞手法就是复沓，其情节多建立在三次重复的基础上。这些最初是供歌手在古斯里琴伴奏下演唱的诗歌口口相传，世代延续，但如今已无人能够演唱，史事歌也从口头走向书面，从生活的现实需求变成了文学的研究对象。现今被收入各种选本的史事歌总共约3千首，其中的主题，即故事和人物，却仅有百余个。



史事歌中勇敢的武士伊里亚·穆拉梅茨
(18世纪70年代的俄国民间版画)

作为俄国文学的源头，史事歌对后世的俄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们以史事歌中的人物和形象为素材所创作的作品，数不胜数，比如，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列夫·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等，就是直接取材于史事歌的。

俄语中的“编年史”一词由“年代”和“书写”两个单词组合而成，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按照年代来记录历史事件的体裁。每一部编年史，都像是俄国历史之树上的一道年轮。

大约从11世纪起，初步具有民族自觉意识和历史感的俄罗斯人开始了编年史的写作和编纂。编年史的作者，大多为修道院的僧侣修士和王公身边的官吏。编年史是关于俄国历史事件的流水账，它是俄国早年历史的真实、客观的记忆，但同时，它也纪录下了当时俄国人关于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对于世界的观察和看法。编年史不仅仅被视为历史著作，因为除了编写者客观、冷静的记叙之外，其中还收录了各种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圣徒行传和战争故事等等，这就使它成了俄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编年史是一种“开放的”体裁，它大多不具有统一的风格，似乎是由各种文体组合成的大拼盘，编年史作者往往首先是一个忠实的摘抄者，因此，俄国的编年史大多表现为“编年史合集”。编年史作者最喜欢使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比较，他们在叙述中喜欢在远古寻找当代事件的“原型”，将身边的生活视为往事的“回声”，就在这样连续不断地对比之中，编年史借古喻今的教谕功能得到了体现。

现存最早的俄国编年史就是大约在1110—1113年间编纂成的《往年故事》，其作者据说是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僧人涅斯托尔。《往年故事》的题目是由后人加上去的，它取自这部编年史的第一句话：“这就是



编年史作者涅斯托尔

(瓦斯涅佐夫作于1885—1893年间)

往年的故事，它叙述俄罗斯国家的来历，最初在基辅为王的人是谁……”这部编年史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叙了罗斯与拜占庭的战争、留里克三兄弟的应邀入主罗斯、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历史、基辅罗斯王公们之间的纷争等等。这部优秀的编年史的内容和文字能使人感觉到，其作者不仅是一个历史往事的叙述者和记录者，他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和卓越的政治家。在后来出现的各种版本的俄国编年史合集中，这部编年史常常被放在篇首，因此，它又被称为《编年序史》。

第二节 《伊戈尔远征记》

《伊戈尔远征记》是耸立于俄国文学源头的一座丰碑，是俄国古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一起被并称为欧洲中古的“四大英雄史诗”。

相对于其他三部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发现较晚，它并不是从中古一直流传下来的，而是在18世纪末才被偶然发现。当时，莫斯科的收藏家穆辛-普希金在斯巴斯-雅罗斯拉夫尔修道院一位祭司处发现了一批16世纪的古代文献，其中就有一份《伊戈尔远征记》的抄本，1796年，这份抄本的抄本被呈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1800年，抄本被公开发表。可是，那份抄本的原件却在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中被焚毁了。偶然的发现过程，抄本原件的缺失，以及这部史诗在其创作年代的俄国文学史中的鹤立鸡群等，使得有人对这部史诗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关于《伊戈尔远征记》之真伪的争论也从它被发现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绝大多数俄国学者和文化人还是对这部史诗的历史真实性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的，在这方面，普希金的意见很有说服力：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是任何一位18世纪或更晚的作者所无法创造出来的；作品中那种荡气回肠的史诗气魄、厚重的“古文献精神”、丰富而深刻的抒情诗意等，更是18世纪的俄国文学中所没有的。

《伊戈尔远征记》以俄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为描写对象：12世纪末，基辅罗斯出现封建割据局面，众多公国各自为政，因而遭到了南部游牧民族更多的侵袭。公元1184年，基辅大公率军征讨南方的波洛夫人（又译波洛伏齐人）获得胜利，次年，没能参加此次征讨的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与兄

弟子侄一起擅自发兵，攻打波洛夫人，结果惨遭失败。《伊戈尔远征记》再现的，就是罗斯历史上的这一悲剧事件。

全诗除序曲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序曲是史诗作者对“古代的夜莺”、伟大的歌手鲍扬的致词，同时也阐明了他写作史诗的动机和目的。正是因为诗中提到了鲍扬，再结合诗中写到的史实，研究者得以将史诗的写作时间确定在1185—1200年之间。至于史诗的作者到底是什么人，众说纷纭，虽然有史家如雷巴科夫等指出，其作者可能就是基辅的大贵族彼得·鲍里斯拉维奇，但这一说法至少还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

第一部分写伊戈尔的出征：尽管在出征前目睹了日蚀的凶兆，伊戈尔仍坚决发兵。有趣的是，据史家考证，俄国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这次日蚀，时间在1185年5月1日下午3点25分，日蚀实际上发生在伊戈尔出征之后，但作者为了体现伊戈尔的决心和勇敢，同时也是为了加强诗中的悲剧意味，有意将日蚀的发生安排到了伊戈尔出征之前。顶着凶兆出征的伊戈尔，在与敌人的相遇中初战告捷，缴获甚丰，可次日早晨却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残酷的战斗持续了两日，伊戈尔全军覆灭，他和自己的兄弟、儿子和侄子都被波洛夫人俘虏。第二部分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含泪的金言”。在基辅罗斯的历史上，斯维雅托斯拉夫并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大公，但史诗作者却将他塑造成一个罗斯团结的象征。在伊戈尔战败前夜，他做了一个“迷离的梦”，在获悉伊戈尔战



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哭诉（法沃尔斯基为《伊戈尔远征记》所作插图）

败的消息之后，他噙着泪水，向整个罗斯道出了“金言”。他责备伊戈尔等为了个人的荣光擅自发兵，同时也谴责了众大公的见死不救以及诸侯们的内讧，“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暴力/才从波洛夫人的国土上袭来”！大公进而号召俄罗斯人在异族的威胁面前统一起来，为国雪耻。史诗的这个中心部分，既可以说是基辅大公的“金言”，也可以说是史诗作者自己的“金言”（在诗中，大公之言和作者的抒情插笔之间的界限也很不清晰），是作者通过这部史诗最想告诉给世人的话。

第三部分写伊戈尔的妻子在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的“哭诉”。这是全诗最优美的段落，体现了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完美结合，雅罗斯拉夫娜也被视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她在城头上哭诉：“光明的、闪亮的太阳啊！/你在爱抚所有的人，/可你为何要把那滚烫的光芒/投射在我夫君的武士们身上？/要在那干涸的原野里，/用干渴扭曲他们的弓，/用忧伤塞满他们的箭囊？”在雅罗斯拉夫娜之哭诉的感召下，伊戈尔终于逃出敌营，回到了罗斯，罗斯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草木鸟兽，都在热情地迎接伊戈尔的归来。这个明朗的结局冲淡了全诗的悲剧氛围，也在诗中强烈的政论激情中注入了抒情的韵味。

《伊戈尔远征记》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珍品，由于在这部史诗前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一部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杰作，它对于俄国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就越发显得突出了。

第三节 彼得改革时期的文学

彼得一世（1672—1725），又称彼得大帝，他10岁即位（1682），7年后亲政，是俄国历史上最强势的沙皇之一。他在位期间竭尽全力发展军力，尤其是海军，并通过与土耳其、瑞典等国的战争在亚速、芬兰湾和里加湾等处获得出海口；在国家的发展模式上，他主张一切向西欧看齐，大到国家体制和教育体系，小到语言和服饰，决心让俄国迅速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强国；他竭力压缩教会的势力，积极发展商业，并在涅瓦河畔创建了新的都城彼得堡，极大地改变了俄国人的生活习惯。所有这些改革，必然会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俄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地看，彼得时期的文学主要体现出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是文学的“西化”。彼得以西欧为榜样的激进改革，也落实在了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如1700年1月1日采用新历，1703年创办第一份报纸《新闻报》，各类学校的创办，来自各个阶层的青年被派往西欧留学，法语等西欧语言在都市和上层社会中的通行，西欧的各种人才和专家纷纷涌入俄国等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俄国的文化开始与西欧文学接轨，无论是就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而言，还是从文学作品的接受方式和社会影响来看，都是这样。西欧的文学作品进入俄国，根据西欧的文学时尚编写的一些教谕小说和轻松诗歌也渐渐步入了大众的阅读视野。

其次是文学的世俗化。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彼得对俄国东正教会实行打压，1721年的教会改革，更是明确地把神权置于君权的控制之下。教会的权力和社会影响的相对缩小，使得一直受到教会压制的世俗文学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着私人印刷所的开办，各种通俗读物大量出现，尤其是其中那些鼓吹进取奋斗、情绪轻松乐观的小说，成为越来越多的贵族和市民茶余饭后阅读和谈论的对象，所谓的“传奇故事”和“爱情小诗”很是流行。世俗诗歌的繁荣，构成了文学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教会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俄国诗歌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直到彼得登基后的17世纪中后期，区别于民间诗歌和教会诗歌的世俗诗歌才获得了真正的发展。在俄国格律诗歌的发展中，西梅



彼得斥子（尼·盖作，1871年）

翁·波洛茨基（1629—1680）起到了一个奠基性的作用，他借鉴波兰诗歌的格律创建了俄语音节诗体。在彼得改革时期，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又在西梅翁·波洛茨基的音节诗体的基础上加入重音因素，进一步制定出了音节—重音诗体，这一诗体一直被沿用至今。

最后是文学的功利化。文学不再被要求仅仅服务于宗教和教会，而且更要服务于政治和国家，在这一方面，政论体裁的兴盛具有某种代表性，当时最著名的政论作家就是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毕业于基辅神学院的普罗科波维奇虽然是一位神职人员，却积极赞同彼得的改革，他写的一篇致彼得的欢迎词引起彼得的注意，因此被召到彼得身边，成为学者侍从团的首领，他将彼得改革称为“罗斯的再度受洗”，论证了彼得事业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彼得改革时期，相对于其他领域，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因为，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更为坚实的积累。到彼得一世去世时的1725年，俄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学大家，古典主义也是稍后在18世纪30—40年代才开始兴起的。也就是说，俄国历史上伟大的彼得时代，却并不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直到一百年之后，才由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完成了彼得一世在俄国历史中完成的那种壮举。

第四节 古典主义

彼得的改革为古典主义在俄国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理性的精神、启蒙的目的和服务国家的志向，这样的文学追求与当时俄国的社会氛围恰好是吻合的。

文学史意义上的古典主义，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因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奉为经典而得名。它以哲学上的唯理论为基础，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包含着内在的规律，文学的目的就是去接近、呼应这些规律，艺术和美的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它在政治上拥护君主专制制度，强调个人及其情感对国家和理性的服从；在艺术上主张严谨的形式和风格，用庄重的体裁表现庄严的主题，史诗、悲剧和颂诗等“高级”体裁受到推崇，戏剧中的“三一律”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则，作品中的人物也多为一些具有理想色彩和献身精神的类型化形